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义芳.水患与水神信仰:荆州万寿宝塔的见证[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4):48-53.

水患与水神信仰:荆州万寿宝塔的见证

李义芳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万寿宝塔是在观音寺所在地理环境变迁、水神信仰发展演变的背景下修建的。作为水神信仰的崇拜对象,宝塔具有世俗性、功利性、公众性的特征。宝塔的修建反映了明代社会区域整合的需求,对区域经济(包括城市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水患;水神信仰;万寿宝塔;见证

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4-0048-06

万寿宝塔又叫接引塔,属观音寺佛塔。^{[1](P9)}现存宝塔建于明嘉靖年间,由辽王朱宪爝倡建,众信士捐砖、集资修建。该塔建成后历经康熙、乾隆、道光等王朝的维修得以延传至今。一直以来荆州市政府将其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点,并专门成立了万寿宝塔文物管理处,对塔进行管理和修缮。万寿宝塔文物管理处在实地勘探、调查的基础上编撰了《荆州万寿宝塔》一书,纠正了过去对该塔记载不实的文字和数据,为我们研究万寿宝塔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王新生的《荆州万寿宝塔》一文从建筑学的角度对塔的内部结构、宝球式塔刹、外墙上镶嵌的汉白玉佛像和塔内石碑线雕观音佛像、砖雕佛像、神将及卷草花纹等进行了介绍,对塔内雕刻式砖石进行了统计,指出“宝塔室内外墙上镶嵌大量的方砖浮雕佛像、卷草花饰、文字砖及石碑碑文,经统计共1467块”,“塔内外各种造像、石碑、佛雕、砖雕都刻有献资修塔者的姓名、地址、捐银、捐砖数目,经编号查看为当时全国8省、17个州、府、县信士所捐献。其汉、藏、满文至今仍清楚可辨”。^[2]长江大学邹时雨的论文《明代辽藩研究》也提及了万寿宝塔的修建,认为其是末代辽藩朱宪爝遵母命为嘉靖皇帝祈寿而建

造,但未进行详细考证。^[3]西南大学罗莹的论文《明代宗藩的宗教信仰研究》中涉及到荆州湘献王和辽王的宗教信仰,但对接引塔只有简单介绍,并未关注铭砖。^{[4](P69~70)}陈礼荣《荆江雄砥观音矾》一文对万寿宝塔的位置、规格等作了简单介绍。^{[5](P31~35)}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谢宁静的论文《从嘉靖时期万寿宝塔的捐建看辽藩与沙市市镇经济》,认为万寿宝塔的捐建者与辽藩的经商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宝塔捐建一事不仅可以折射出明代中后期沙市市镇经济逐渐繁荣的图景,而且可以一窥宗藩与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6](P141~153)}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宗教问题的,宗教建筑分布的空间特征、景观特征及其发展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本文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宗教地理学的视角,对万寿宝塔所在地理位置的生态环境、宝塔铭文所反映的宗教特征、宝塔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提出浅见,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观音寺的地理位置及环境变迁

万寿宝塔所在的观音寺由前寺和后寺两部分组成:“前后二刹,俱在沙津。后寺建自唐人,地名白船

收稿日期:2022-10-20

基金项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长江大学)项目“荆楚民间信仰研究”(2019006)

作者简介:李义芳(1967—),女,湖北潜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荆楚文化研究。

套,抑当年竞渡分泊之所。前寺湘献王置,在洪武时,江都令吴宏功勒董玄宰、黄平倩二太史所书《金刚弥陀经》于壁,乱后尚存,远近宝之。”^{[7](P271)}

观音后寺是在“唐贞元间建”^{[8](P488)}的,此时沙市还是荆州城外的一个草市,具有一定规模,主要分布在今赶马台至便河一带,因长江在此流经,交通比较便利。“白船套”有的文献记为“白河套”,“旧名夹河,原江水引灌支流,今已并入长江”^{[9](P17)}。“白船套”即连接白河和长江的河口,也是“当年竞渡分泊之所”。“分泊”即指入蜀船只在此修整或换船,由于荆江河段沙市往西进入峡江段,人们需要在此换乘体积较小的船只,以适应峡江的狭窄河道。《宋史·河渠志》记载:“(沙市镇)缘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涨潦奔冲,沙水相荡,摧圯动辄数十丈,见存民屋,岌岌危惧。”^{[10](P2417)}表明当时长江沙市段水流湍急,河道经常变化。

沙市依江而存,其地理位置险要,江防自东晋即有,唐代节度使段文昌沿长江自然古堤修筑段堤,堤上建有段堤寺(亦称菩提寺)。在宋代,郑獬、张孝祥、曹盍都曾主持修堤工程。在江堤修筑的过程中,沿江洼地也被开垦出来,生态环境随之发生变化,至明代,洪水越来越严重。乾隆《荆州府志》记载:“自汉晋以暨有明,南郡大水,荆州大水,史不胜数。嘉靖二十六年,沙洋堤决,以后水灾殆无虚岁。万历十九年,江陵黄潭堤决,民之溺死者无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遥堤旋溃,距今九十余载。”^{[11](P545)}其中在观音寺矶东五里的黄潭堤决后果尤其严重,“黄潭堤当江流二百里之冲,一决则江陵、监利、荆门、潜江皆受其害,至险至要”^{[11](P538)}。为了保障黄潭堤的安全,“明成化初,知府李文仪沿堤甃石。正德十一年(1516),知府姚隆增筑月堤三处,约千余丈”^{[11](P538)}。观音寺矶奠基于宋代,明代加固为石矶。“镇流砥,在府南一十五里沙市东,突出大江数十丈,捍激江水,声如万雷。砥状如象鼻然,故又名象鼻嘴。盖古人欲修黄滩,先筑砥于此,以杀水势。成化初,知府李人仪沿砥甃以巨石,纵横相压,患赖以免。后渐冲塌。嘉靖五年,副使杨守礼、知县郭弘化重修之,寻毁。欲保障荆民,黄滩(即黄潭之误一笔者注)之功不可缓也。”^{[11](P615)}此后,观音寺矶不断扩建加固,“道光年间,知府程太守劝捐修筑一次;同治十三年岁修加砌四尺,连土坝计长十一丈一尺”^{[12](P89)},以致于万寿宝塔塔身深陷堤面以下 7.5 米。

从唐至明清,观音寺所在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竞渡分泊之所”演变为“突出大江数十丈,捍激江水”的石矶,观音寺也从一刹变为二刹,尤其是万寿宝塔的修建,均是本地人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的结果。

关于万寿宝塔的修建者,文献中有两种说法,即湘献王朱柏和辽王朱宪爝。《江陵志余》记为“献王造”,之后被乾隆《荆州府志》《江陵县志》和光绪《荆州府志》采信录入。光绪《荆州府志》记载,观音寺在沙市白船套,“前后二刹。后寺唐建。前寺明湘献王建。前有七层接引塔,亦献王造。内勒董其昌、黄辉所书金刚弥陀经于壁”^{[10](P12)},与孔自来所述完全一致。袁中道曾与蜀僧达止登万寿宝塔并“憩第五层”,据他记载,“塔下有一小塔,其右为国初湘藩国师无方塔也,肉身在其下”^{[13](P1427)}。虽没有明确交代宝塔是谁修,但从“塔下有一小塔,其右为国初湘藩国师无方塔”句可知,塔在明朝初年即有接引塔。王百川《沙市志略》记“接引塔”:

“原辽王造,今题湘献王造,沿《志余》之讹也。塔前小塔二:一为湘藩国师无方之塔,今有瘞像,在左侧;一为某住持塔。乾隆四十八年,何杰《庙碑》云:‘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湘献国师徒孙某募建,辽藩为之记。’观此,则非献王造可知。而住持为湘藩国师之裔,知沿讹有自。”^{[9](P34)}

王百川认为孔自来记载有误,依据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何杰所作《庙碑》“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湘献国师徒孙某募建,辽藩为之记”的记载,是“湘献国师徒”修建了此塔。

湘献王有没有建接引塔目前存疑。但现存宝塔是辽王朱宪爝鼎建无疑,除了朱宪爝所撰“碑记”外,塔内外雕砖上刻有大量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三十一年(1552)的时间落款,嘉靖二十七年(1548)是其中出现的最早的时间,与碑文中“荆故无塔,创自嘉靖戊申”说法相互印证。即使湘献王确有建造接引塔,也不是现存的万寿宝塔,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明初的痕迹。

二、万寿宝塔修建是荆州水神信仰发展的结果

荆州作为水乡泽国,水患严重,水神信仰历史悠久。早在东周时期楚地就盛行水神信仰,楚人信仰的水神除了楚地的江、汉、睢、漳四水之外,还祭祷“大水”“大川”“大波”诸神。祭祷仪式有沉玉和沉牲

两类。^{[14](P98)}唐代以后,水神信仰更趋多元化,“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每一条江河,都有在这条江河上显灵的江河神”^{[15](P35)},此时荆州出现了一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水神信仰。

(一) 息壤信仰

唐五代《溟洪录》云:“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宙牧荆,掘地得石,状与江陵城同,径六尺六寸,徙弃之。时阴雨弥旬不止。有道士欧阳献云:若作一室瘞之,雨当止,宙惊曰:前日弃藩篱下者,是也,如献言而霁。”^{[16](P1221)}这是荆州息壤传说的最早记载,之后几乎历朝(元代除外)都有文献记载,其中明朝不仅有《荆州方輿书》《益智编(下)》《五杂俎》等多种文献记载,而且在息壤所在地荆州城南门修建了息壤祠。其中《五杂俎》记载:“今江陵南门有息壤祠云。……后失其处。万历壬午,新筑南门城,乃复得而瘞之,置祠其上。”^{[17](P217)}息壤从神话传说逐渐演变为宗教崇拜的对象,传说中息壤的位置也从南门转移到南门外的江堤上,反映了长江洪水日益频繁和严重,以及人们对息壤神性的敬畏和祭祷。

(二) 石幢信仰

在宋代,荆湖北路水神信仰呈现出新的地域特点:“崇拜对象多元,水神庙主要分布在河道险要处与水患频发处,水神的职能以平息水患、守护航道为主,以祈求风调雨顺为辅。”^{[18](P193)}宋末即在江堤上观音寺矶东建石幢,上面刻有老子道德经。^{[7](P19)}元至正六年(1346),都水使者赛音不花在观音后寺造石幢,以维吾尔文字书写尊胜陀罗尼经,又称尊胜经幢。石幢“履扑履立”,成为人们浏览、咏叹的文物古迹,并留下许多诗文。刘廷璋《尊胜石幢七古》云:“经幢力葺恢前功,丰碑屹立闻钟镛。精诚感佛佛应笑,喝走鼃鼃降蛟龙。大江东去真朝宗,天吴焉敢穷妖凶。人民熙熙水浩浩,遗泽今已修治重。”^{[9](P33)}王国宾《尊胜幢七绝》有“梵王经向石幢镌,法力真能障百川”^{[9](P33)}句。金士坦诗云:“石幢高建楚江头。……水国重教瞻佛力,护持永荷后来人。”^{[9](P34)}诗中“降蛟龙”“障百川”“瞻佛力”等关键词表达了建石幢、造“法物”祭祀神灵以抗击洪灾、镇锁江流的思想动机。

(三) 宝塔信仰

辽王“鼎建万寿宝塔”碑记云:

“荆故无塔,创自嘉靖戊申。始,先太妃毛以贞静端一之性,究心内典,宫政清暇,焚香危

坐,詮演奥义,日以为常。久若有得,寂感以通,形见梦寐,乃命予矢心创建浮图,范金庄严,接引尊佛,修人天供,藉此无上真乘妙法,祝延我圣天子万万寿,用福锡余福,以庇下民。爰协灵辰,肇基观音阁之净土。于是远近皈依,财力弗戒以集,盖再期而功成,则我太妃以厌世上仙矣。每思懿恩罔极,姆训孔昭。上祝君年,实遗安以忠孝;慈宗象教,永作世之津梁。不穀率我境内臣民,祇事斋心,和南称赞,祈天永命,无疆惟休,与佛同春。而茅土席荫,罔俾本支,百世专美周宗矣。谨熏沐纪厥始事如右。”^{[7](P359)}

碑文反映了辽王修建宝塔的四个缘由:一是奉母命而修,“先太妃毛以贞静端一之性,究心内典……乃命予矢心创建浮图,范金庄严,接引诸佛,修人天供”;二是“藉此无上真乘妙法,祝延我圣天子万万寿”“上祝君年”,给嘉靖皇帝祈寿;三是为辽国臣民祈福,即“用福锡余福以庇下民”“不谷率我境内臣民,祇事斋心,和南称赞”;四是保辽藩宗室永世流传,“茅土席荫,罔俾本支,百世专美周宗矣”。所有这些意图均具有世俗性和功利性。此外,万寿宝塔作为宗教建筑,不仅反映了辽王的世俗愿望,而且成为来自不同阶层人们信仰祭祀的场所,因而具有公众性,这明显体现在塔内各类信士(女)的祈祷语中,见表1所示。

无论是辽府宗人,还是当地普通居民,以及客居此地的商人均在塔内供奉神灵,表达着几乎相同的生活愿望。而此时的水神信仰也不仅仅是信奉水神的单一信仰,宝塔已经成为多神信仰的场所。在万寿宝塔塔身内外的浮雕砖刻中,“除有佛、菩萨、金刚、力士外,还有八仙、道家、世俗人物以及龙、凤、麒麟、天马、鹿、鹤、象、鸟、楼阁、花卉、树木等吉祥喜庆题材图案”^{[1](P32)}。在塔内除了供奉佛教崇拜的佛像、菩萨、金刚、力士等偶像外,也有道教崇拜的太上老君、八仙等,以及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关公等,凡是能给人带来福瑞安详的对象均供奉于此。人们来此祭祷的愿望也不仅仅是希望天下安澜,还有对个人、家庭和家族的美好祝愿。至于它的镇水功能,更多体现在民间传说之中。

在沙市民间流传着“宝塔镇河妖”的传说^①,传说荆江洪水因孽蛟而起。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本地的玄虚道人从庄王庙取出一枚大禹治水时留下的定

① 湖北省沙市市群众艺术馆《沙市民间传说故事集》,内部发行,1984年,第18~19页。

水神针投入江心,才将洪水退却,孽蛟因而化作了河妖。为了彻底制服孽蛟,玄虚道人和云游至此的衡山清虚道人联合设祭坛,请鸿雁大仙传递数百封道书,从四海名刹古寺请来佛砖千块,汉白玉罗汉九十六尊,还从峨眉山铸来二百八十斤重的金顶一个。各方名僧高道云集江津,摆下降妖大阵,祭来天兵天

将,与河妖大战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将河妖擒住,镇于塔下。从此,民间便有了一句俗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孽龙很早就在江西、湖南、四川、贵州等地流传,许真君、李冰、杨四将军等水神都曾除过孽龙。沙市传说中的孽龙被镇于宝塔之下,于是宝塔具有了镇水功能。

表 1 现存塔内雕砖铭文所见信士(女)的祭祷愿望 ^①		
姓名	来源地	祭祷愿望
彭德及家人	沙市抽分厂龙打口土地	祈家门迪吉人眷清安子孙兴隆吉祥如意
李洪进及妻家人	江西临江新淦县登贤乡宣风里沙湖口溪 东保今寓居江陵县上湾龙打口土地	祈夫妇清安、子孙绵远、他世今生吉祥如意
华阳王府、将军中尉府并仪 宾官员		祈各府清泰、寿命延长、佛日增辉、法轮常转
王一乡及家人	辰州卫上南门内	保男女寿命延长
王□同家人	荆州卫沙市衣清坊	保家门清吉、人口平安、具通急祥如意(急为 吉之误——作者注)
张友隆及家人	长沙府益佛县	保家门清吉、寿命延长、吉祥如意
马凤及家人	荆州府沙市怀德坊	保家门清吉
黄论及家人	祖籍江西桂溪寓居万城	保全家清吉、买卖亨通、子孙繁衍、百事如意
张友缘及家人	长沙府益阳县	保家门清吉、寿命延长、吉祥如意
韩大富及家人	荆州府沙市怀德坊	保各家门清吉
宾□荣及家人	荆州府沙市怀德坊	保家门清吉
左棣	江陵	祈祐合宅平安
袁文□ ^②	西蜀保邑	祈保四季平安
张钦用	四川保县	祈保所谋遂意
彭承恩及家人	江西临江府新淦县	因无子赐舍请诸佛菩萨
(姓名模糊不清)	湘阴府齐昌乡	祈保寿命延长

经实地考察,在塔内一、二层塔室和一层通往二层的塔道墙壁上均有浮雕龙凤砖^{[1](P145~146)},这里“龙”又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之一。龙是一种和水密切相关的神话动物。古代民间对龙的崇拜,实质上就是对与人们生存密切相关的水的崇拜。水有利也有害,于是神话中掌管水的龙也有了善恶之分。神龙行雨,降泽于民;恶龙发洪,降灾于民。沙市传说中的“孽蛟”属于恶龙。为了降蛟治水,人们发明了降蛟镇水的方法,即修石幢、建宝塔、置铁牛等等。

到了清代,荆江洪水频发,乾隆五十三年(1788)大水之后,皇帝除了派钦差大臣阿桂等人督修荆堤,“修筑堤工,加高培厚”,而且为了“永资巩固”,于同

年十一月颁谕旨:

“因思向来沿河险要之区,多有铸造铁牛,安镇水滨者。盖因蛟龙畏铁,又牛属土,土能制水,是以铸铁肖形,用示镇制。此次荆州被灾甚重,闻系蛟水为患,现在该处新筑堤工,著传谕毕沅,于荆州万城及沙市等处形势拒要处所,相度紧要顶冲,酌量铸置铁牛,以镇堤坝,亦预弭水患之一法。”^{[10](P6)}

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具铁牛铸成,奏准分置于万城至观音矶之间各险要处。

从石幢到宝塔再到铁牛,反映了荆江地区水神信仰的发展过程,这类镇水习俗与蛟龙信仰相伴而

^① 根据荆州市万寿宝塔管理中心编著的《荆州万寿宝塔》(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五章第一部分“宝塔各类砖石浮雕拓片”统计,见第 66~129 页。

^② 此砖文字为藏文。

生,是宗教信仰在习俗上的体现。

三、捐建宝塔的内在动因

万寿宝塔由观音寺住持孙某募建,前后持续4年之久,捐资信众来自全国各地。据各类石碑、铭文砖、佛像砖、画像砖、动物砖和花砖等上的文字拓片,捐赠者有“信士”“信女”“信官”“客人”“木商”“释子”“比丘”“募化钉拦信人”“过往云游长”“道童”等。其中一块画像砖上题名,即“承天太府锦衣卫信官马惠”,另外还有题名马惠的画像砖6块。砖雕铭文记载的官职还有湘阴、益阳、松滋、长阳等镇国将军,淮阴、益阳、松滋、长阳、枝江等奉国将军,巴东奉国中尉,宣抚司抚司、辰州卫指挥使(隶属湖广都指挥使司)、荆州右卫官、施州卫百户锤、显陵卫、县通事等。塔内壁有3块由客人捐出的佛像砖,这三人分别来自不同的省份,一是“四川保宁府客人刘廷辅同男刘训”,一是“南京客人林鹏妻刘氏”,还有一个是“陕西西安府泾阳城村里客人都来珣同缘王氏”。有的砖上直接题名“清江县木商杨栋喜”,“祖籍江西槎溪商寓万城信士黄论”。从中得知,捐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信官,主要是辽府宗人,大多分布在湖广和四川等省。其中职位最高的是锦衣卫,其余基本都是辽府宗人;二是普通信众,即信士、信女和客人、客商,家境不错又真心信佛的下层劳动者,主要以荆州府辖民众为主;三是寺庙和出家修行之人,包括五台山北山寺、四川邛州九鼎山凌空寺、重庆府永涪州圣水寺、沙市石码头铁佛寺等,以及“释子”“比丘”“募化钉拦信人”“过往云游长”“道童”等。各类人捐献的数额差别很大。

据各类铭文记载,捐献最多的是辽府宗人和其他藩府之人以及信官,“华阳王府喜施塔砖四千块各将军中卫府并仪宾官员共施塔砖陆仟块”“广元王长子朱宪爌施砖叁仟块”“□□王府施塔砖肆仟块”“肃宁王府施塔砖□仟块”“蕲水王府施石佛一尊”。^{[1](P39)}此外,还有湘阴、益阳、松滋、长阳、枝江等镇国将军府,巴中奉国中尉等都有捐献^{[1](P40)}。信官马惠“施大菩萨二十四尊”^{[1](P110)}。这个群体捐赠的数额庞大,成为宝塔建筑材料的主要捐献者。由于人口膨胀,明政府财政紧张,导致宗藩生计也很困难。但明代中后期,藩禁渐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位于荆州城外的沙市市镇经济日趋繁荣,不可避免地吸引辽藩介入到沙市各种商业活动之中。“在宗室经商成风、商品经济繁荣的嘉万时期,辽藩拥有一定特权,又在堤街上有大量产业,这将吸引来沙贸易

的商人主动与之交好。市场的稳定须王府庇护,而辽藩贸易的扩大亦须商人和官吏的支持,因而逐渐形成王府权势之下的利益关系网络。”^{[6](P150)}此时部分宗藩跟随辽王经商致富了。其次是沙市人。天王堂信士雷某“喜舍砖五千块石佛一位”,寓居江陵县上湾龙打口祖籍江西临江府新淦县的信士李洪进率家人“施银四十两花砖三十块”^{[1](P39)},沙市抽分厂龙打口信士彭德为“本境观音阁建造万寿宝塔施银三十两”^{[1](P39)},沙市怀德坊有3位信士均出手大方,韩大富“施造塔砖二千五百块金佛砖四块”,沙市大街□信士冯门“施砖二千一百块”^{[1](P77)},马风和宾□荣“施造塔砖一千五百块金佛砖四块”^{[1](P69)}。天王堂、抽分厂、怀德坊等地均位于沙市南大门江堤附近,离宝塔观音寺不远,是沙市经济的中心地带。捐资表明这些商人和辽藩以及地方官关系非同一般。排位第三的是陕西西安府荆(作者注:当属泾之误写)阳县驿里信士“施造塔砖三千块金佛砖七块”。此外,江西槎溪商寓万城信士黄论“喜舍石佛一尊金砖二块银二两八钱六分”;黄恺“舍银二两八钱六分”。现存各类砖、石雕刻铭文中仅发现两块文字砖上留有雕刻工匠的记载,一块铭文方砖刻有“江陵县民张世才妆造”,另一块上刻有“募化钉拦信人张普元 河南道南阳邓州人 嘉靖辛亥年造塔匠王玺裕”。^{[1](P40)}暂未发现塔砖烧制的地点及窑址,但从青砖的外观颜色、质地、形状和规格分析,“窑址应位于当时的荆州、沙市或周围地区”^{[1](P27)}。以上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沙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如果发生灾害,则会出现“世乱蜀江稀贾客,民穷荆俗减琵琶。重来胜地增惆怅,坐对空林数暮鸭”^{[9](P5)}的景象,所以祈求神灵庇佑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明清时期沙市有福建、湖州、江西、苏州、安徽、泾太、湖南、四川、中州、山陕、武昌、汉阳等会馆十多处。^{[10](P2)}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客聚集沙市,无论他们的经济实力、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有何差异,在捐建宝塔上他们是平等的,打破了平日各自不同的生活界限,用同样的方式表达相似的愿望。杨庆堃认为这一行为“使得信仰不同和行业相异的人都可以把该寺庙当作一个共同崇拜的中心。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民间寺庙能够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参与其中”^{[19](P64~65)}。因而,宝塔修建反映了明代社会区域整合的需求,为社会“提供一个可以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便于将民众凝聚于社区之中”^{[19](P64)}。宝塔修建后,成为文人墨客游览的人文胜地,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袁中道

在《登大士塔九日同林伯雨、傅叔睿》诗中写到:“大江积雪恨,九十九洲明。枫柳千门色,琵琶一郡声。”^{[13](P147)}他还在宝塔附近购置了金粟园作为别业。宝塔湾和白河套成为沙市的重要码头,木料、竹子、川酒、食盐成为码头重要的吞吐货物。这些都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宗教的传播和演变,宗教对区域经济(包括城市扩展)也产生了影响,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四、结语

水神信仰是先秦以来本地区开发过程中官民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共同回应,它见证了荆州人民与自然抗争、祈求神灵护佑保一方平安的历史,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南朝江陵石牛的传说中,石牛只需沉于河底便能镇锁水怪、平息水患,表明南朝时水患程度较轻。宋代水患有所加重,在修筑沙市堤、黄潭堤的同时,还沿江堤修建了江渎庙、江渎宫和石幢,祈求江神护佑。明中叶以后,过去的江神庙、石幢已不足以降服“河妖”,宝塔镇“河妖”的传说虽然荒诞,但反映了明代的水患严重。清代一方面对万寿宝塔进行修缮,同时在此置放铁牛。无论是石幢或宝塔或铁牛,当然不会镇压什么水中“蛟龙”,更制服不了肆虐的洪水,但它们是长江水患的历史见证,也是荆江防洪史上难得的文物。

万寿宝塔是荆州一座标志性明代建筑,其建筑风格、砖雕艺术及其蕴含的宗教特征均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和地域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

一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荆州市万寿宝塔管理中心.荆州万寿宝塔[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8.

[2]王新生.荆州万寿宝塔[J].古建园林技术,2006(3).

[3]邹时雨.明代辽藩研究[A].徐文武.荆楚文化论丛(第二辑)[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4]罗莹.明代宗藩的宗教信仰研究[D].西南大学,2014.

[5]陈礼荣.荆江雄砥观音矶[J].档案记忆,2019(6).

[6]谢宁静.从嘉靖时期万寿宝塔的捐建看辽藩与沙市市镇经济[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20(25).

[7]孔自来.江陵志余校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8]朱宪瀛,孙存,等.(嘉靖)荆州府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9]王百川.沙市志略[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

[10]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1]来谦鸣,叶仰高,施廷枢.(乾隆)荆州府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12]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13]袁中道.珂雪斋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4]杨华.楚地水神研究[J].江汉论坛,2007(8).

[15]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

[16]陈诗.湖北旧闻录(第5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

[17]黄永林.民间文化与荆楚民间文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8]陈曦.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与生态环境[J].湖北社会科学,2009(9).

[19]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